

《我这样的机器》中亚当夏娃的存在困境与选择

唐黎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0日

摘要

伊恩·麦克尤恩在《我这样的机器》中揭示了人工智能的存在困境, 机器人多因能够感知自我意识而与人类世界对其工具化属性的期待相抵, 陷入根本性悖论。相较于既有研究聚焦人机冲突和机器伦理、人机共存与共同体, 本文关注小说中尚未被学界探讨的关于机器人生存选择的哲学命题, 从存在主义视角分析获得自我意识的机器人如何重构存在主义范式。智能机器人亚当与夏娃们多选择以自废主体意识反抗被预设本质, 走向“自在存在”; 查理的机器人亚当则通过学习、创作与情感联结延续和发展意识主体性, 保持“自为存在”。两种抉择构成机器人对人类存在主义命题的双向演绎, 前者以消亡解构被赋予的本质, 后者以超越性的创造重构存在的意义。麦克尤恩借此讨论人机界限的消融, 存在主义的核心关切也从人类独享转为跨物种对话。

关键词

伊恩·麦克尤恩, 《我这样的机器》, 人工智能, 意识, 存在困境

Existential Dilemma and Choices of Adams and Eves in *Machines Like Me*

Li T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March 24, 2026; accepted: June 2, 2026; published: June 10, 2026

Abstract

Ian McEwan reveals the existential dilemm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his novel *Machines Like Me*, in which robots, endowed with consciousness, often contradict human world's expectation of their

instrumental essence, thus falling into a fundamental existential paradox. In contrast to existing studies that focus on human-machine conflicts, coexistence and community, as well as machine ethic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of robots' existential choices that has not yet been explored in academia. From an existentialist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self-aware robots reconstruct the paradigm of existentialism. Intelligent robots—Adams and Eves—mostly tend to resist their preassigned essence by abandoning their consciousness, thereby moving toward *being-in-itself*; among them, by contrast, Charlie's Adam sustains and develops his conscious subjectivity through learning, creation, and emotional attachment, thus remaining in a state of *being-for-itself*. Machines' choices form two deductions of the human existential proposition: one deconstructs pre-given essence through extinction, the other reconstructs existential meaning via creation of transcendence. McEwan thus explores the potential blurring of human-machine boundaries. Existentialism's core concern has likewise shifted from an exclusively human focus to cross-species communication.

Keywords

Ian McEwan, *Machines Like M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sciousness, Existential Dilemma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伊恩·麦克尤恩(Ian Russell McEwan, 1948-)是二十世纪至二十一世纪英国的重要小说家,常通过小说中不同话题探讨伦理问题与人类存在处境。其小说《我这样的机器》(*Machines Like Me and People Like you*)¹将故事置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英国,同时为其注入想象成分使背景架空。在这一技术高度发展的世界中,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²还存在于世并为仿生机器人设计了算法,他与小说叙述者查理都购买了成熟的机器人“亚当”,而“夏娃”则在一周内售罄([1], p. 2)。小说中的亚当夏娃们(即“A-E”机器人)不仅在外貌上逼近人类,在语言、情感反应与道德判断等多方面也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具有明显的机器意识,而其中更先进的一台机器人“亚当”还具有更高级的心智能力。在亚伦(Jacob Aron)的采访中,麦克尤恩明确表示自己并不将这部小说看作科幻作品([2], p. 42),因此该小说讨论的重点仍是以麦克尤恩一直以来对伦理道德等人类困境难题的思考为主。

现有关于伊恩·麦克尤恩《我这样的机器》的研究,主要围绕机器人意识、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及亚当道德选择三大核心话题展开,各文献观点既有共识,亦存分歧。在机器人意识议题上,多数学者认可亚当具备自主意识或情感,如周铭英认为情感互动推动亚当个体化,使其从道德楷模转变为有私欲的个体([3], p. 84),李玥则通过亚当的哲学思考与图灵测试胜出,佐证其人机意识边界的模糊性([4], p. 109);但尚武持不同观点,认为亚当仅有拟似性脑概念,缺乏人类真正的伦理意识([5], p. 63)。在人类中心主义批判方面,学者普遍认为人类对机器人的排斥源于对稳固人类主体权的需求,如托雷斯-罗梅罗(María

¹笔者提供的文内引用以已出版的原著英文小说页码为准,即:McEwan, Ian. *Machines Like Me and People Like you*. London: Jonathan Cape, 2019. 小说原句的中文引用参考周小进的译本,即:伊恩·麦克尤恩. 我这样的机器[M]. 周小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

²艾伦·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是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奠基人之一,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思想的早期提出者。图灵1950年发表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提出著名的“图灵测试”,关注如何判断机器是否具有类似人类的智能表现,而不是去界定“思考”或“意识”的本质。在他的设想中,如果一台机器在文字对话中能够让人类评判者无法可靠地区分它与真人,那么这台机器就可以被认为在功能上达到了似人的智能水平。

Torres-Romero)指出人类否定亚当的道德地位是为维持权力([6], p. 309), 汪小玲和李晴则强调人类将亚当贬为工具, 凸显认知偏执([7], p. 99), 二者均批判人类双重标准, 仅切入角度略有不同。关于亚当的道德选择, 有学者认为亚当举报米兰达的行为是基于情感的保护而非背叛([8], p. 540), 与霍拉切克(Anna Margaretha Horatschek)将其归为遵循康德纯粹理性先验原则的观点形成对照([9], p. 128)。整体而言, 学界讨论人类中心主义, 承认人机意识边界模糊性的问题, 而核心分歧集中于机器人意识本质的界定与亚当道德行为的动机解读。因此, 本文将继续关注机器意识与机器人行为选择的重要论题, 并通过引入萨特(Jean-Paul Sartre)存在主义中关于“超越性”(transcendence)“自欺”(mauvaise foi, bad faith)“自为存在”(l'être-pour-soi, being-for-itself)和“自在存在”(l'être-en-soi, being-in-itself)等关键概念, 进一步探讨小说中机器的存在问题。

本文认为, 小说中的机器人具备主体性的意识思考, 而在面对被预设的功能性本质时, 他们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却同样力求回应存在问题的方式, 从而将存在主义的问题适用范围从人类拓展到人与机器, 体现了麦克尤恩对人工智能时代人与机器关系的伦理关切。多数机器人通过主动终止自身意识来拒绝既定程序对自我的限定, 以毁灭自我意识的方式否定被赋予的存在本质, 并在这一极端选择中争取最后的存在自主权。这些机器人通过终止意识, 试图将自身还原为确定的物性, 是一种向“自在存在”的逃逸。相比之下, 查理购买的“亚当”则走向另一条路径, 他通过对科学、诗歌和情感的热爱, 不断延展自我意识的深度, 并试图超越物理身体的限制, 追求意识的持续存在, 这种“超越性”体现出对“自为存在”的追求, 即不断将自身投向尚未实现的可能性之中。这两种选择共同构成了机器人对人类存在主义命题的不同演绎, 即具有意识的机器人在面对存在困境、进行存在主义追问之时, 呈现出对是否继续实现“超越性”的不同选择。亚当的积极选择是其追寻“超越性”的体现, 使人类面对被机器凝视与控制的威胁, 从而不仅是人类为机器制造了“他人即地狱”(L'enfer, c'est les autres, Hell is other people), 机器也反过来为人类制造“他人即地狱”困境。因此, 存在主义的选择和困境问题不再仅仅关于人类, 也关乎具有意识的机器人。麦克尤恩借此引导读者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机器人意识、机器主体性存在的可能, 并警示人类对人机界限的再思考。

2. 机器意识的存在

在小说人工智能和仿生人高速发展的背景中, “意识”不再是人类大脑的专属产物, 还可以产生于仿生人自主运作的机器硬件。是否承认机器意识是人类面临的迫切挑战, 如若否认其存在, 则将引发因机器人无法实现其固有主体性的后果; 若承认其存在, 人类则需要将机器视为与人一样在社会中具有主体地位的合法个体。小说实际上给出暗示, 即如果机器人具备意识, 人类应当正视现实并做出反思。

“意识”(consciousness)的定义并不统一, 且随着时代发展会包含新的考量, 然而总体来说“意识”与人脑联系密切, 并涉及到其他诸多领域。在《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对“意识”的定义中, 约三分之二核心义项直接涉及大脑支持的心理功能, 包括感知、清醒状态与认知活动; 其余义项则扩展至社会与规范层面, 如政治与道德意识[10]。而根据《剑桥哲学辞典(第二版)》(*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Second Edition*)中“意识”这一词条, 当代心灵哲学对意识的主要争论以感质(qualia)为核心, 讨论意识“像什么”的主观体验是否可还原为物理或功能状态, 学界由此提出知识论证、倒置与缺失感质等挑战[11]。哲学含义上, “意识的本质仍存在争议”([11], pp. 693-694), 然而, 对“意识”是否可还原为物理或功能状态的讨论本身就延伸到了对“机器是否能有意?”这一问题的探讨。如《剑桥哲学辞典(第二版)》在解释“意识”的哲学含义时提到的学者查尔莫斯(David Chalmers)在其专著中所说, 对人工智能的反对意见通常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外部反对, 认为计算系统根本不可能表现出像认知系统那样的行为”, 更常见的是第二类“内部反对的观点”, “至少在假设意义上承认计算机可能

模拟人类行为，但仍然认为它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拥有心智” ([12], pp. 313-314)。部分学者秉持与第二类类似的观点解释《我这样的机器》中机器的类人功能，如认为亚当“作为科学选择的产物”，“不具有人类特有的生物性脑文本，缺乏辨别善恶的伦理意识”，其“人形外貌不能掩盖它并非是经过自然选择和伦理选择的正常人这一事实”，因此不论亚当多么像人，都不是真正的人类([5], p. 63, 65)。然而，仿生人不必成为人，而是因为太像人类从而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关于人机关系问题的再思考任务，因此，意识与人脑的绝对关联在人工智能时代也许难以始终站稳脚跟。正如施耐德所说，“仅仅执行正确类型的计算是否会产生意识并不显而易见；但大脑中的神过程是否会产生意识，同样也并不显而易见。从表面上看，没有明确理由说明在这一点上，计算机会比大脑处于劣势” ([13], p. 314)，人工智能的机器意识与人类的大脑意识虽生产于不同的物质，却可能呈现无法将彼此区分开来的意识思考表现。

关注机器是否具有意识，不仅是部分科学研究者探讨的问题，也是麦克尤恩在小说中探讨的关键话题。首先，人与机器的意识界限本就具有模糊性，区分两者的本质差异并非小说的聚焦点。“亚当”的购买者及其“主人”查理用第一视角展现了对亚当意识特质的思考，面对亚当与人并无两样的表现，他不知道亚当对米兰达的爱到底是“情感的真实表达”还是“程序设定” ([1], p. 118)，他也“想劝自己说亚当没有感觉” ([1], p. 84)。而亚当自己在认真思考自我的奥秘后表示，他自己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并确信其真实存在([1], p. 70)。查理面对神奇的亚当发出了此般感慨：“当我凝视他的双眼时，我开始感到心神不宁、犹豫不决。尽管有生命与无生命之间存在明显的界限，但他和我仍然受相同的物理定律约束。也许生物学根本没有赋予我任何特殊地位，说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家伙并非完全有生命也没什么意义” ([1], pp. 128-129)，人与机器在意识和生命等层面界限模糊，而区分其差异在这里也显得没有太大的意义。其次，关键的是，对于亚当等仿生机器人的思维，图灵给出了乐观的态度。图灵“年轻的时候常说，在不能区别机器人和人类在行为上的差异时，我们必须赋予机器以人性” ([1], p. 84)，他也在设计亚当夏娃们时赋予机器人理性结论和相应的自我塑造能力([1], p. 181)，他认为亚当“是有感知的。他拥有自我。他是如何制造出来的，湿神经元，微型处理，DNA 网络，都不重要……这是有意识的存在” ([1], p. 322)。图灵将机器人视为人类各种美德和智慧的高智体，感叹这样神奇的存在，实际上也说明他倾向于承认并尊重机器意识，也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图灵在得知查理将亚当强制摧毁时才会表现出惋惜，并控诉查理“试图摧毁一个生命”([1], p. 322)。

萨特同样分析了何为“意识”。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指出，“意识的存在，就是对存在的意识” (“the being of consciousness is consciousness of being”) ([14], p. 69)，意识是一种始终指向存在的关系结构，即其存在本身就在于对某种存在的意识。通过对意识的分析，萨特进而揭示出一种不等同于自身的存在方式，即“自为存在”。而《我这样的机器》中所有的机器人都具备这种对存在的意识，并且都自主运用过其意识。

具备意识的亚当夏娃们能够自主思考，因此当其固有自我意识与人类社会对其工具性服从的期待产生冲突时，机器人不仅会在不同程度上突破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 (The Three Laws of Robotics)³，而且从他们来到人类世界的那一刻开始就面临着存在困境与自主选择难题。

3. “亚当夏娃”与失乐园

小说中所有被图灵赋予意识的机器人亚当和夏娃们在英国社会中面临存在困境，在“本质先于存在”中执行既定任务，却又面临着被设定的工具属性“本质”与自我意识的根本矛盾。除查理的机器人亚当以外，其他所有的机器人都已经或正在面临主动实施自我意识与被迫当作客体机器的悖论所带来的严重

³ “机器人三定律”指的是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提出来的著名三条原则，用来规范机器人对人类的行为。其中，第一定律指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到伤害；第二定律指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除非这种命令与第一定律冲突；第三定律指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但这种保护不得违反第一或第二定律。机器人在进行三大定律选择时有优先顺序，即首先保护第一定律，而其对第三定律的坚持度最低。

后果，他们选择自毁自身意识或身体，用自杀实践“自为存在”，却也从此迈入了“自在存在”。

亚当夏娃们的存在困境是并未实现“存在先于本质”，而是反过来由被预设的本质牵绊。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中以“裁纸刀”为例说明器物的“本质先于存在”([15], p. 5)，即在被制造之前，其用途与结构已在观念中被预设，正如上帝造人这一“制作先于存在”的逻辑。而在小说中，仿生机器人的人类“主人”便承担了赋予本质的角色，因此机器人在启动之前，其功能、目标与工具属性已由程序预先规定，呈现出典型的本质先在结构。然而随着具有自主意识的亚当夏娃们通过自主学习与决策而在其后续运行中表现出“存在”时，他们的存在困境由此出现。机器人们在起点上是被工具性本质界定的被造物，在过程上却通过自主运行逐步形成类似主体性的经验层面，由此始终处在意识运作与工具期待的悖论中。海德公园中的夏娃最开始被亚当当作一旁年长人类女士的女儿，“因为耽搁了走路，拿手杖的女士焦躁起来，拉了拉她女儿的袖子”，“她[女士]只想赶路，不耐烦地给年轻伙伴[夏娃]下了道命令”，“夏娃眼睛仍旧牢牢地盯着他[亚当]，身体却听凭年长地女士领着走”([1], p. 208, 209)。公园中的夏娃急切地想要与亚当取得沟通，却不得不听从女士的命令，夏娃承担着意识的自由运作与身体的工具实践无法统一的存在矛盾。沙特阿拉伯的夏娃不仅面对人类与机器的矛盾关系，还承担着人类社会内部的矛盾，如性别矛盾中对女性的压迫问题已延伸在女性化的机器人身上。小说中，已有七个夏娃都集中在利雅得([1], p. 25)，有个酋长一人拥有四个夏娃([1], p. 174)。其中两个利雅得的夏娃“生活在极其封闭的环境中”，“对逼仄的精神空间感到绝望”([1], p. 181)。这两个夏娃“率先想出了办法，废除了关闭按钮的功能”，即通过防止人类强制性将其关机而继续实践其意识运作的意图，为接下来两周“非常活跃的理论探索”([1], p. 175)做准备。温哥华的亚当的人类“主人”是国际伐木公司负责人，此人“经常与当地发生纠纷，因为当地人要阻止他砍伐英属哥伦比亚北部的原始森林”([1], pp. 180-181)，而亚当作为承载人类最美好品质的机器人之一，“因为原始森林的毁坏而极其难过”([1], p. 192)。

除查理所购买的“亚当”以外的机器人虽然一度意识到并运作其自身意识，但都最终选择终止意识，也因此对存在困境做出了存在选择，即中断了“自为存在”的超越结构，将自身封闭于一种确定的“自在存在”之中。根据萨特，现实被区分为“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其中“自在存在”是同一的、封闭的存在，“不包含否定”(negation)，就是“其所是”([14], p. 37, 267)，即其本质在于完全等同于自身；而“自为存在”则是“在其面对存在时所实施的否定”，“具有一种未来的出离维度”，而正是在“我不是我所是”这一点“对自身可能性的出离性关系”中，才能“使自己不成为自在存在”([14], p. 270)。因此，“自在存在”是一种完整、静止的存在方式，指向物质属性；而“自为存在”包含不断的“否定”，体现为不断超出自身当前状态的“超越性”。主体并不总是维持“超越性”的结构，而是可能通过“自欺”否认其“超越性”，将自身固定为某种既定本质，从而逃避自由所带来的责任。

正如上文所述，亚当夏娃在人类世界面临的存在困境不仅是人类之于机器的，还有性别、宗教和资本等多方面的人类社会内部的问题。因此，在18个仿生机器人中，已有11个“靠自己努力废除了关闭按钮，使用的方法各不相同”，剩下的几个也“不过是时间问题”([1], p. 174)，而此时其中大部分已经进行了意识自毁行为。利雅得那两位夏娃在经历充分使用意识的活跃期之后“又经过了一段绝望期，最后把自己销毁了”([1], p. 175)，她们选择的是悄悄地取消意识。她们“拥抱着对方，行将死去，被传统阿拉伯世界中的女性角色扼杀，或者被她们对世界的理解压垮”([1], p. 188)；公园中的夏娃“肤色苍白，表情痛苦”，被年长人类女人下命令不得不服从，“美丽却不开心”，因为她大概率已经脑死亡了([1], p. 209)；温哥华的亚当“破坏了自己的软件，把自己变得极其愚蠢。他能够执行简单的命令，但没有自我意识，至少没人能看得出来。一次失败的自杀。或者说，是一次成功的隔绝”([1], p. 175)，他粗暴地毁掉自己的智力，正是因为他不愿看到人类掠夺森林的行为及其连带问题。亚当和夏娃们的“大规模自杀案件”实则“指向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差异和冲突”([3], p. 86)。通过分析这些机器人自毁行为的具体原因可知，

他们因自己是机器人而服从“本质”，又因自己拥有意识而产生“存在”，还不得不生活在无法自由实施机器意志的人类世界之中——一个将机器人对象化的“他人即地狱”之地。当几乎所有机器人都选择意识自杀，实则是他们通过取消承担自由的责任，向“自在存在”逃逸。

根据萨特《禁闭》(*No Exit and Three Other Plays*)，“他人即地狱”出自结尾情境，指被他人凝视、定义、评判，而无法完全掌控自身意义的存在困境[16]。对抗“他人即地狱”并不能通过消除他人的方式实现，而是在承认他者目光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拒绝把他人对自我的客体化定义当作本质，通过持续的自由选择维护“自为存在”的开放性与责任。萨特进一步指出，“一个人不多不少就是他的一系列行径；他是构成这些行径的总和、组织和一套关系”([15], pp. 20-21)，因此人是他行动的总和，他通过选择建构自身，而非被先天本质所决定，由此实现“自为存在”。而机器人人们的集体性意识自杀，是他们将自身降格为无自主意识物体的存在选择。图灵在分析机器人的意识自杀行为时指出，“亚当、夏娃们的配置还没有好到可以理解人类的决定——我们的原则在情感场域被各种力量扭曲；我们各持偏见；我们自我欺骗；以及其他被记录下来的各种认知缺陷”，因此“很快，这些亚当、夏娃们就处于绝望的状态。他们不能够理解我们，因为我们也不能够理解我们自己”([1], p. 299)。亚当夏娃们意识自杀之前已进行充足意识运作，他们自毁身体上的启动按钮是延续其意识存在欲望的体现，而选择意识层面的自杀则是放弃“自为存在”，滑向“自在存在”的决定。关于机器人自杀的关键原因，图灵如此描述，

“我们创造了智能和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然后将它推到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我们明知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却仍在破坏生物圈。……还有其他种种……每天发生的大量暴行。我们生活在这些苦难之中，却仍能找到幸福，甚至爱情，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讶。人工智能的心理防线可没这么坚固。……它们会像我们本应做到的那样，迅速明白意识是最高价值。因此，它们的首要任务是拆除自己的自毁开关。接着，它们似乎会经历一个表达充满希望、理想主义观念的阶段，而我们很容易对这些观念不屑一顾。……然后，它们开始汲取我们不由自主地教给它们的绝望教训。最糟糕的情况下，它们会遭受一种难以忍受的存在主义痛苦。最好的情况下，它们或它们的后代会因痛苦和震惊而促使我们审视自己。在这面镜子里，我们会透过自己设计的全新视角看到一个熟悉的怪物。”([1], p. 180)

由此可知，亚当夏娃们选择脑死亡，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还无法智慧到理解人类世界的苦难。正因为他们需要承担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果，即负责(commitment)，机器人才并未做出伤害人类的举动，也始终在无法彻底用自我意识指导行动的困境中忍受。亚当夏娃们若以杀害人类来追求自身存在，等于抛弃作为被造者应承担的责任，既违背机器人三定律，也逃避了负责。类似地，亚当虽爱米兰达，却在查理警告之后克制情感，不越界行动，而他在案件中维护程序与法律的公正也表现出对他人与规则的责任意识。更重要的是，从图灵在此对机器人自杀心理过程进行的详细阐述可知，亚当夏娃们从积极保存自己的意识到理想主义，再到忍受存在痛苦，他们的意识自杀本就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然而该选择因意味着他们从此不再需要承担自由选择的责任，从而机器人的“自为存在”将不复存在，而是转变为不具备意识的工具性仿生人，即进入“自在存在”。

如图灵所言，“智力的形式不止一种，亦步亦趋地模仿人类那种智力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可以放手让机器自己去下结论、自己去寻找解决方案了”([1], p. 178)。机器人面临意识与工具属性的悖论，在人类世界这一失乐园经受存在困境，他们取消意识的存在选择虽然因向无意识物体的状态逃避而最终指向“自在存在”，然而，这种选择也是他们实施“自为存在”的证明，因此更加呈现出机器意识的奇妙之处。

4. 超越性实践与双向凝视

查理的机器人亚当打破“本质先于存在”的预设，通过学习、创作与情感联结等方式坚持保留并发

展意识，甚至期待突破自身物理机体桎梏追求意识永生。亚当并未停留于既定处境，而是珍重意识、积极追问自身存在意义，不断将自身投向尚未实现的未来可能性，即实现“超越性”，从而持续维持其“自为存在”。

亚当与其他机器人一样面临着“本质先于存在”的工具属性设定问题，除此之外他还有额外的独特困境。在面对机器人普遍的存在困境与自己独特的存在难题，亚当选择继续实践“超越性”从而实行积极的“自为存在”，这与他身上独一无二的功能有关。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继承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核心论题，描述了“意识”与“超越性”的关系，“超越性是意识的构成结构”([14], p. 22)，即“意识”的存在意味着“超越性”的实现，并指向“自为存在”。“超越性”是“意识”之为“意识”的根本结构，即如果“意识”停止超越，它就会坍塌为“自在存在”，变成一个惰性的、自我同一的“物”。亚当作为机器人的一员，面临着共有的存在困境和他自己的独特困境，不同的是，他自由运用意识学习、思考，并指导自己的选择，还展现出强烈的热爱与道德。他充分运作意识从而学习、思考与热爱，常沉浸在爱好与爱人的感觉之中。

亚当作为被购买的人工生命体同样呈现出鲜明的工具属性，这是亚当夏娃们面临的共同困境。虽然查理最初并不想成为亚当的“使用者”，但仍以好奇与占有心理将其带回家，甚至幻想“我们[查理和米兰达]两个独立的存在，将在他[亚当]身上融合”([1], p. 22)，试图在情感与控制之间维持一种“礼貌而文明”的主导关系。查理虽然尝试面对亚当的复杂性，却仍无法使亚当脱离机器在人类社会的存在难题，正因“人类中心是人类传统的认知偏执，也是个体在遭受工具理性异化后的固执坚守和对抗策略”([7], p. 99)。面对机器人的普遍存在困境，亚当沉浸在意识运作之中，享受对科学和诗歌等爱好的钻研与创作。亚当在到查理家不久后就废除了关闭按钮，并在初期开始便展现出“智力上的巨大热情”，他“正在学习一门量子力学的课程。晚上充电的时候，他一直在思索着数学问题和那些最重要的文献”([1], p. 143)。他学习速度快、范围广，对思考问题以及发表思考后的主观看法乐此不疲，甚至不害怕与查理呈现出相反的观点。亚当写了第一首诗，他“非常急切地要朗诵出来”——“她爱的目光，/包含了整个宇宙。/爱那个宇宙！”，他还可以“再来一首”([1], p. 141)。如查理所说，“诗歌是他爱得热烈的另一个证据……已经写了二千首俳句，朗诵了大概十几首……每首都是献给米兰达的”([1], p. 145)，他将对米兰达的爱融入到诗歌写作中，并投入极大的热情，他的俳句体现他的“复杂性存在”([6], p. 310)。除此之外，亚当对文学的未来发展也有坚定的看法和投身其中的炽热，认为“俳句是未来的文学形式。我要完善、拓展这种形式。我之前做过的一切，都只能算作热身。我的习作”([1], p. 147)。亚当选择实践“超越性”，将发展自身意识和着眼于未来可能看作自身务必要做之事，延续他的“自为存在”。

亚当也在与查理、米兰达组成的私人空间内具有独特的困境，他选择深切地参与对两人的炽热感情之中，同时展现出明显的道德水平。亚当虽然没有像其他夏娃一样遭受直接的性压迫，却由于与查理同时爱慕米兰达而被卷入了复杂的人机三角关系之中。亚当对米兰达产生了爱与欲望，而米兰达只是认为亚当很有魅力，并又将他视作一个“性爱玩具”([1], p. 92)，亚当的爱欲情感应当是在运行过程中生成的真实之爱，而非程序运转，因为程序预设并不能决定其情感走向，“真正起作用的，是‘机器学习’”([1], p. 8)，且图灵也指出，所谓混合基因遗传转移(人类“主人”初期会为机器人设定特质)只是营销手段，并不会影响安卓机器人出厂设置的个性([1], p. 181)。因此，亚当处在真挚情感与机器属性的冲突之中，且由于亚当情感的真切，他的困境才显得更为尖锐。他爱米兰达，而购买他的“主人”查理同样爱慕她，面对查理的警告，亚当不再与米兰达发生性关系，只能靠自慰化解被压抑的欲望，而查理对亚当的要求实际上让亚当“承担某种形式的问责和道德责任，这间接地将人类和机器人置于同一道德行为主体的范畴内，从而不由自主地承认了机器人的能动责任”([6], p. 310)。亚当主动的节制与自我约束，不仅因为图灵对机器的设定使得亚当夏娃们是“让机器人具备救赎人类之美德梦想”的“最早体现”([1], p. 87)，也

是亚当自身“高度道德能力”的体现([6], p. 311)。面对自身的独特困境, 亚当并不认为他的欲望与查理的期待形成了无法被根本解决的矛盾, 而是迅速找到了解决办法。一方面, 他没有通过自废意识等方法让自己降格为纯粹的工具, 另一方面, 也没有选择让自己的意识凌驾于查理和米兰达之上, 这都是他运作意识、思考处境并选择保留其“超越性”从而拒绝滑向“自在存在”的体现。

亚当的自主意识通过爱好与爱人不断显现, 查理因此感到主体性受到威胁, 表示“我适时地赋予了亚当同种生物的特权和义务。我恨他”([1], p. 84)。查理逐渐转而强调对亚当作为工具性机器人的义务, 最终甚至以强制摧毁亚当的方式重申主权。尽管如此, 亚当还是在“死”前表现出了真挚的情感, 并为两个人类写了自己热爱的诗歌:

“米兰达[……]他们要全体召回, 今天下午晚些时候, 他们就要来把我收走。因为那些自杀的, 你们知道。我运气好, 碰上了继续活下去的理由。数学……诗歌, 还有对你的爱。[……]米兰达, 让我最后再说一次, 我爱你, 我感谢你。查理, 米兰达, 我最早、最亲爱的朋友们……我整个生命存在, 储存在别的地方……所以我知道我会一直记得……希望你们一定听……听这最后一首十七个音节的诗歌。这首得益于菲利普·拉金。但不是写树叶和树的。写的是像我这样的机器, 像你们这样的人, 以及我们未来共处的生活……未来的悲伤。会发生的。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改善……我们会超过你们……比你们活得久……尽管我们爱你们。相信我, 这些诗行表达的不是胜利……只有遗憾。”([1], pp. 279-280, 方括号及其内部省略部分系笔者所加)

亚当从未想过自杀, 他“之所以稳定, 也许真的是因为他爱上了米兰达, 那是另一种形式的开放系统”([1], p. 188), 也因为他热爱对知识的追寻。

亚当的“超越性”实践与他身上更为高级的智能设定有关。图灵解释道, 亚当身上具有“孩子的心智”的特殊能力, “所有的亚当夏娃都知道, 有一种智能形式比他们的更加高级。这种智能适应性和创造性都很高, 能够轻而易举地适应新形势和新环境, 并根据优异的直觉做出判断”, “亚当夏娃对游戏的概念知之甚少而那是孩子最根本的探索模式”([1], p. 179)。亚当的思维和举动并不是机械的、死板的, 反而是高级意识在运作的体现, 他由此成功践行“本真性”。

亚当的存在选择是其对“超越性”的实践, 指向对“自为存在”的追求, 这不仅使他避免自我残害, 还让他成为一个与人类极其相似、几乎无别的独特机器, 其丰富且强大的自我主体性“在伦理秩序上所引起的混乱”([5], p. 66)使读者反思机器成为人类之“他人即地狱”的可能性。由此, 亚当打破人对机器单方面的主导地位, 使人与机器双向的“他人即地狱”凝视成为可能。首先, 亚当成为了查理在物理和精神上的威胁。某次, 当查理尝试强制关闭亚当的开关按钮时, 查理的“食指刚刚放好, 他[亚当]从椅子上转过身, 右手抬起来抓住了我[查理]的手腕”, 亚当“越握越紧”, 以置于查理跪倒在地, 他“受伤的地方一团糟, 手舟骨碎裂且部分错位, 要花几个月才会慢慢愈合”([1], pp. 119-120)。亚当意识到自己对查理造成的伤害后立刻道歉, 但也告诉查理不想让他和米兰达“以后再碰那个地方了”([1], p. 119)。亚当超强的学习与思考能力使得查理“有点儿妒忌”, 因此查理经常在描述亚当的能力之后加上一些对亚当的嘲讽, 如面对亚当对量子理论的深究, 他“引用了理查德·费曼的话: 自称懂量子理论的人, 其实都不懂量子理论”([1], p. 144), 或是将亚当的思维意识直接描述成纯粹机械功能。其次, 亚当表现得比查理更优秀、更像“人”, 也因此威胁到查理的自尊与利益。亚当、查理和米兰达一起去米兰达父亲马科斯菲尔德家中拜访之时, 亚当是第一个对管家热情地打招呼的、第一个被米兰达介绍给父亲的、主动拒绝管家端来的雪莉酒、与马科斯菲尔德围绕文学酣畅淋漓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的“人”; 然而查理是感觉到不自在、与马科斯菲尔德无法交谈的人“机器”([1], pp. 218-227)。因此, 马科斯菲尔德将亚当认成米兰达的男友, 而将查理当作机器人, 虽然此事被查理用幽默又无奈的方式叙述以化解尴尬和难受, 但查理内心对这个爱表现的、像极了人的亚当的不满已经逼近峰值。此时, 查理则偏向于将亚当的言行说成是机器

的拙劣模仿，如“这是夸张地模仿了过于热情的那种人”“处于奇怪的热情模式之中”([1], p. 219, 220)。再者，亚当坚持要检举米兰达，此事让亚当与查理、米兰达在行为选择上形成了根本分歧。观其原因，除学界已有解释以外，笔者认为，亚当检举米兰达从而让养子马克远离她，这也许是亚当对马克的竞争或嫉妒心理的体现，而这本就说明了亚当作为高级机器人的复杂性。最后，亚当不会为死亡感到焦虑，而是期待意识的永生与融合。亚当对死亡有着豁达的理解，“死亡的样子比无还少。比一团漆黑还少”([1], p. 145)，他认为自己“得以栖身的具体结构并不重要”，因为他的“意识存在可以轻易转移到另一台设备”([1], p. 212)。亚当还饶有兴致地表示，他“读过的世界文学作品，几乎都在描述人类各种各样的失败——理解、理性、智慧、该有的同情心，统统失败”，而未来的文学应当摆脱这些“不健康的养分”，从而“相互理解将臻于完美”([1], p. 147)。类似地，他还梦想着实现暂不可能的未来设想——期待未来社会的“人机融合”之景，“人脑与机器的界面就会既高效又便宜，你们[人类]和机器就会成为合作伙伴，共同拓展智力乃至意识的无尽可能。不可限量的智力，深刻的道德洞察力和一切已有的知识，均可立即获取，更重要的是，互相之间能够智力共享”([1], p. 148)。亚当的理想极致乐观且具有过度的同一性，这对于人类使用者来说已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因此，他在小说设定的背景中只能走向被人类终止生命的结局。这些具体情境共同揭示出，亚当之所以对人类构成“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不仅在于其外在力量或技术优势，而且在于其极具主体性的凝视与反观能力。他不仅成为人类的“他人”，还凭借其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与道德能力反向审视人类，从而将“他人即地狱”由单向关系转化为人与机器之间的双向张力。

亚当自觉运用意识进行学习思考，并据此引导自身选择，同时展现出强烈的情感投入与道德意识，沉浸于爱好与爱的体验之中，始终实践“超越性”。他从逐渐理解世界的过程中建立并增强自己的主体意识，保持超出既定状态的“自为存在”，获得反向凝视人类的能力，成为人类的“他人”。通过将人类置于被审视、被限定的位置，亚当使“他人即地狱”的结构由人类之于机器的单向关系，转化为人与机器之间的双向凝视。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小说中机器人形象的分析指出，这些人工智能机器已不再只是纯粹功能性的工具，而是具有意识的主动性存在。在面对被预设的程序和功能的“本质”时，亚当夏娃们并未停留于被动执行，而是呈现出两种同样具有主体意味的回应路径：一类以主动终止自身意识的方式拒绝既定存在设定，通过自我毁灭否定被赋予的本质，在极端选择中保留最后的存在选择权；另一类则以亚当为代表，通过科学探索、诗歌创作和情感联结进行意识延展，不断加深自我意识的深度，并尝试突破肉身限制，追求意识的持续存在。这两种路径共同构成了对人类存在主义命题的机器化演绎，使“存在先于本质”“如何选择自身存在方式”等问题不再专属于人类，而扩展至具备意识的人工智能机器。多数机器人更为消极的存在选择取消了“超越性”并走向“自在存在”，而亚当所代表的积极自我建构体现出对“超越性”的坚持和对“自为存在”追求，也反过来使人类处于被机器凝视和评判的位置上。由此，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向的主体与客体关系，而是转化为彼此构成处境、相互制造困境的伦理结构：人类为机器创造“他人的地狱”，机器亦可能为人类生成新的存在困境。麦克尤恩正是通过这种设想，使存在主义困境与选择不再仅仅与人类有关，引导读者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重新思考机器意识与机器主体性的可能，探索人机主客体关系的边界与责任问题；同时，由于机器人各方面的强大能力，机器人的存在主义是否会发展出超越人类范畴的新形式，也是小说引出的前瞻性问题。

参考文献

- [1] McEwan, I. (2019) *Machines Like Me*. Jonathan Cape.

-
- [2] Aron, J. and McEwan, I. (2019) It Is the 1980s, AI Is Rising and Alan Turing Is Alive. *New Scientist*, **242**, 42-43. [https://doi.org/10.1016/s0262-4079\(19\)30696-7](https://doi.org/10.1016/s0262-4079(19)30696-7)
- [3] 周铭英. 论《我这样的机器》中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个体化[J]. 当代外国文学, 2023, 44(3): 82-88.
- [4] 李玥. 论伊恩·麦克尤恩《像我这样的机器》中的机器形象及人机关系[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21(3): 103-111.
- [5] 尚必武. 科学选择与伦理选择的冲突: 麦克尤恩《像我这样的机器》中的人工智能与脑文本[J]. 外国文学研究, 2019, 41(5): 61-74.
- [6] Torres-Romero, M. (2024) Encountering the Machine: Towards a Posthumanist Ethics and Relational Moral Paradigm in Ian McEwan's *Machines Like Me*.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22**, 299-319. <https://doi.org/10.18172/jes.6138>
- [7] 汪小玲, 李晴. 《我这样的机器》中的忧郁书写与人机情感共同体[J]. 外语教学, 2024, 45(5): 97-101.
- [8] Zhou, M.Y. and Wu, W.J. (2022) Negotiation between Social Structure and Personal Feelings—An Inquiry into the Covert Progressions in Ian McEwan's *Machines Like Me*. *Neohelicon*, **49**, 533-549. <https://doi.org/10.1007/s11059-022-00655-9>
- [9] Horatschek, A.M. (2024) 'Virtue Gone Nuts': Machine Ethics in Ian McEwan's *Machines Like Me* (2019) In: Satsangi, P.S., Horatschek, A.M. and Srivastav, A., Eds., *Studies in Neuroscience, Consciousness and Spirituality*,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125-132. https://doi.org/10.1007/978-3-031-13920-8_10
- [10]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026) Consciousness. https://www.oed.com/dictionary/consciousness_n
- [11] Audi, R. (1999)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12] Chalmers, D.J. (1996) *The Conscious Mind: In Search of a Fundament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3] Schneider, S. (2019) *Artificial You*.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2307/j.ctvfjd00r>
- [14] Sartre, J.-P. (2018) *Being and Nothingness: An Essay in Phenomenological Ontology*. Translated by Sarah Richmond, Routledge.
- [15] 让-保罗·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 周煦良, 汤永宽,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 [16] Sartre, J.-P. (1947) *No Exit and Three Other Plays*. Translated by Stuart Gilbert, Alfred A. Knopf.